

章炳麟著

尙書 初刻本 重訂本

中國近代學術名著

主編 錢鍾書
執行主編 朱維鈞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主編 錢鍾書 執行主編 朱維鈺·朱維鈺 編校

中國近代學術名著

尙書

初刻本

重訂本

章炳麟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廬書 初刻本 重訂本/(清)章炳麟著. —北京:生活·讀書·
新知三聯書店, 1998.6

(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/錢鍾書主編)

ISBN 7-108-01149-2

I. 廬… II. 章… III. 章太炎-文集 IV. B259.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98) 第 16019 號

版次	版次	出版發行	著者	責任編輯	封庫設計	版式設計	廬書 初刻本 重訂本
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第一版	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	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 (北京市東城區美術館東街二十二號)	章炳麟	潘振平	寧成春	陸智昌	
開本	開本	郵編	經銷	印刷			
六三五×九六〇毫米 十六開	三千冊	一〇〇〇一〇	新華書店	北京新華印刷廠			
印數	印數						
三十萬一千字	印張二十八·三七五						
定價	定價						
三十九元							

編者說明

《中國近代學術名著》的晚清編，主要輯集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中國人文學者的代表性論著，以期展現中國學術文化從傳統到現代的變異過程。

遴選的學者和論著，着眼於學說有新意，有己見，在思想的文化的或政治的領域，發生過深遠的歷史影響。

結集則不拘一格，以專題為主，每種或收一人一書，或輯一人多篇，或合不同作者的同題論著為一編。

編者對每種都做以下工作：選擇底本，取原校較精的刊本；異本互勘，不偏信通行本或整理本；覆核引文，凡原著約引節引而與出典差異較大者均出校記；重施標點，包括分段；編製索引，分人名、書名兩類。

編者對每種都撰有導言，附於篇前。導言既重可讀性，以助讀者瞭解相關專題的歷史實相；也重學術性，當然屬於導言作者的一得之見。為行文簡明，諸導言凡引證出處、攷訂史實或商榷

疑義，均以附注形式陳述。

限於編校出版的條件，晚清編擬分輯刊行，初定每輯十種，先成先印。如可按設想出齊，當能略見系統性。

這套選編，設計始於一九八八年，由當時主持香港三聯書店的董秀玉創議。編輯設想、編纂

方案和擬選目錄，均經主編錢鍾書先生審訂，交由執行主編朱維鈺組織實施。

全編原定由兩岸三地同時出版，因而版式定為繁體字直排。第一輯早已編成發排，由於種種

緣故，長期不克面世。現由北京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和香港三聯書店同時推出。

編者感謝復旦大學歷史系、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處參預編纂的年輕同仁、感謝三

聯書店辛勤校勘的諸位編輯，同時期待高明指正。

編例

一、本叢書選輯十九世紀初至辛亥革命前的部分思想學說名著，每種均由編者予以校勘整理：

底本。以原刊為主，有不同版本者擇善而從。

校勘。正底本排校舛誤，兼正原作者明顯筆誤，並以他校核查原著引據正誤。一般不作理校。

除對校諸本擇善而從者外，凡校勘改動處均出校記，以頂注形式見於同頁。他校所得亦以校記出之，於正文不作改動。

節錄。於篇題下注明，並於篇末注明節錄出處。

標點。原刊本無標點或僅有舊式斷句者，概施以新式標點。

分段。文言文論著均重分段落，以便讀者。

注釋。作者原注概從原刊。編者增注限於指出原著有關之人物年里仕宦著述等明顯謬誤，以頂注出之。

譯名。中文譯名及譯文概從原刊。如原刊注有外文並有謬誤，則由編者逕予改正。為方便閱讀，若干種書未附有新舊譯名對照表。新譯名均依中國大陸出版物的通行譯名。

版式。概用繁體字，直排式。除涉及語言文字學說外，凡原刊古體字異體字，均改為通行繁體字。原作或有雙行夾注，現均改為單行夾注。

索引。所選諸種均增編人名、書名兩種索引，以便通檢。

二、本叢書所選諸種，專著原作者序跋及他人序跋有參考價值者，予以保留，並移作附錄。每種前均冠以導言一篇。

一九九六年五月

導言

朱維鈞

壹

《愼書》是章炳麟的第一部自選集。初刻本共收論文五十篇，寫作時間可考的有十九篇。其中最早的一篇，始作於一八九四年九月；最晚的一篇，則完稿於一九〇〇年一月底之後。〔一〕據我的考證，這部自選集初次刊行的時間，約在一九〇〇年二月中下旬到四月上旬之間。〔二〕

由章炳麟的《太炎先生自定年譜》可知，他在《愼書》初刻本問世後，自我感覺便不好，所謂「意多不稱」〔三〕。據他自述，還在一九〇二年七月他從日本回歸故鄉餘杭隱居以後，就將這書「復為刪革傳於世」〔四〕。刪改過的《愼書》，共輯論文六十三篇，附錄四篇，於一九〇四年夏曆四月在日本東京排印出版。這就是《愼書》重訂本。

事實上，在初刻本以後，還出現一種版本，書尾附有初刻本目錄所無的二篇論文，題作《愼書補佚》，頁碼也另起。據我的考證，這是初刻本的再印本，可稱作初刻補佚本，出現時間約在一九〇〇年夏秋之間〔五〕。

這表明，《愼書》初刻本問世不過半年，作者就對它的内容不滿意了。這種不滿意，很快發

展爲自我否定。

爲什麼？一看《愼書》的命名，便可知緣由。章炳麟曾解釋取名的用意，說是因爲這書「述鞠迫言」。我曾指出，這正是在告訴讀者，「那裏面輯集着窮蹙的環境迫使他非說不可的話」；「所謂窮蹙，當然主要指作者所處的社會環境，尤其指關係着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政治環境。」既然如此，假如環境雖變，而作者仍感不滿，不是又會有話想說，並刪改乃至否定舊說嗎？〔六〕

貳

人們早就注意，章炳麟否定《愼書》初刻本的體系，是同他割辦易服的行爲相聯繫的。〔七〕章炳麟並不是剪掉辮子以示反清的作俑者。但他的這個舉動，是在一個特殊場合採取的，因而格外引人注目。那場合，便是一九〇〇年夏天的上海「國會」。

世紀交替之際，似乎總是多事。隨着十八世紀的結束，清帝國的權力極峯出現過「和坤案」，集中暴露了帝國統治集團的腐化程度。從此「盛世」一詞便與清朝歷史絕緣。隨着二十世紀的來臨，清帝國又內受義和團的困擾，外受八國聯軍的攻擊。從慈禧太后向各國宣戰，到攜帶光緒皇帝狼狽逃出北京，歷時不到兩個月。就在這兩個月間，即一九〇〇年六月下旬到八月中旬，清帝國真正出現土崩瓦解的局面。首先是劉坤一、張之洞爲首的南方督撫，拒絕執行宣戰詔書，而與各國領事訂約實行「東南互保」；接着是八國聯軍佔領首都，沙俄軍隊搶佔帝國「龍興

之地」東北；而後是流亡海外的康有為、梁啟超一派，由唐才常出面，以上海作為活動中心，策劃在長江流域起兵「勤王」；而孫中山一派則以香港為據點，策劃在廣東的惠州發動起義。

或許由於梁啟超代替其師康有為充當主謀的緣故，唐才常在上海顯得頗為能幹。他先將「正氣會」，改名「自立會」；隨即成功地聯絡了汪康年，共同串連江浙本地和由天津避難來滬的老新黨人士，籌開「中國國會」。同時他又在長江中下游的鄂湘贛皖諸省，以「富有票」名義，收買哥老會，組織自立軍，秘密準備同時發難起兵「勤王」，而這項活動居然又瞞過了汪康年和他的朋友。【八】看來章炳麟也在被瞞之列。

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六日，經過汪康年、唐才常等奔波月餘籌組的「中國國會」，終於在上海愚園舉行。經過出席者五十二人票選，清廷前駐美副大臣容闓當選為議長，著名的《天演論》譯述者嚴復當選為副議長。【九】這個常被稱作「國會」的團體，是由政治傾向和眼前追求很不相同的人士所組成的鬆散聯盟。

依照章炳麟在當時的描述，這個「國會」自始便有保皇和排滿兩大主張的對立。【一〇】其實公開持排滿主張的，也許只有他一個人【一一】。但他描述的對立主張，即用「迎蹕」名義贊成乘亂劫持光緒帝南下另組政府，却在由誰主其事的問題上意見分歧，至少有四種方案【一二】。這是不可忽視的，表明當時參加「國會」的人士，實際目標多麼不同。

章炳麟的主張，被歸納為兩點：「不許滿人人會，救出光緒帝為平民」【一三】。前一點，由不久便公開發表的《請嚴拒滿蒙人人國會狀》【一四】，得到證實。誰都知道光緒帝是滿人，因而

他如被拒斥於「國會」之外，則由此「國會」選舉產生的「新政府」首腦，當然也將光緒帝拒斥於外。因而後一點「救出光緒帝爲平民」，將因前一點成立而自動生效。但事過境遷，唐才常早在當年被張之洞捕殺，光緒帝也在八年後不明不白地死去。而章炳麟還在民國十七年作《自訂年譜》述及此事時，還覺得有必要聲明他當年斷髮是爲了反對唐才常起兵以「勤王」爲名。【二五】給人印象是他曾參與自立軍密勿。可惜至今得不到任何第一手記載作證，只能存疑。因而所謂當時章炳麟希望擺脫保皇主義的羈絆，樹起反清排滿的義旗云云，至少用在討論他和唐才常的關係上，是缺乏佐證的。

「中國國會」有着複雜的國內國際背景。在國內，李鴻章對它「印象不錯」，劉坤一「也不打算妨害它」，張之洞的私人特使陶森甲在一九〇〇年八月四日加入了「國會」【二六】。在國際，站在梁啟超、唐才常、汪康年等後面的，首先是近衛文麿的日本同文會，其次有庇護康有爲的英國在新嘉坡的殖民當局，而容閔、嚴復也各自與英、美官方人士有聯繫。既持排滿主張而缺乏國內國際背景的唯一人物，就是章炳麟。

因此，在同年七月二十九日上海「國會」第二次會議上爭論失敗後，章炳麟於激怒中割辮易服，作《解辮髮說》，並將此文與《請嚴拒滿蒙人人國會狀》，寄給他僅有一面之緣的孫文，並附以表白排滿立場的長信，那便不奇怪。《詩》曰「嚶其鳴矣，求其友聲」，可作爲辮子已剪而雖悔無由的章炳麟此時心態的寫照。

叁

於是章炳麟加入革命黨一夥了。接踵而來的，是受到追捕，被迫逃亡。據清末曾在東京聽他講授《說文》的魯迅說，他被追捕有七次之多。「一七」十多年前我曾試圖詮釋章炳麟「七被追捕」的具體過程，終因史闕有間而存疑。但無論如何，章炳麟從此沒有改變過排滿主張。

在思想學說上否定過去，當然不像剪掉辮子那樣容易。直到一九〇二年七月以後，章炳麟才着手重訂《疍書》「二八」，上距補佚本出版已近兩年。這固然由於生活不安定「一九」，但這期間的論著，也表明他正處於理論上的蛻皮過程「二〇」。

《疍書》初刻本幾乎沒有引起公開的反響。今見當時名家作出的最早回應，是一九〇〇年四月十七日嚴復致章炳麟的一封信。但信中評論的不是他贈送給嚴復的《疍書》和《儒術真論》，而是他的人品。在歷讀張元濟等九人後，嚴復說：「至於寒寒孜孜，自闢天蹊，不可以俗之輕重為取捨，則舍先生吾誰與之歸乎？」「二二」這當然是讚辭，但由於嚴復頗好《老子》，未免令人以為這也是「正言若反」，說的是《疍書》不被人理解。

相反的回應則見於章炳麟本人的兩封信。一九〇一年三月三日，他致函汪康年、吳保初，說的都是再至上海就職的住所問題，因為以往「寄寓」的朋友胡惟志拒絕他再住己宅，「以《疍書》故，頗有謠詠」「三二」。這似乎可以作為《疍書》初刻本影響很大的證明。然而章炳麟本人便不信，他知道真正的理由是講排滿，而又被牽連入唐才常案中的緣故「三三」。

這不是說初刻本沒人讀，而是說不被理解。那原因，正如魯迅後來所回憶的，「我讀不斷，當然也看不懂，恐怕那時的青年，這樣的多得很。」〔二四〕

因此，當年報章雖曾說過，《乂書》初刻本，「印本一出，風行一時」，但那是在替《乂書》重訂本做廣告；而同一廣告便說：「此等空前傑作，文辭淵古，不加點注，一般閱者，咸苦無從分其句讀」。〔二五〕這不正好印證魯迅的回憶麼？現存的重訂本，初版確有圈點，乃是「著者摯友圈定本」〔二六〕。不過，一般讀者，雖可因此免受讀不斷之苦，仍難免看不懂之厄。原因無他，就在於文筆古奧，索解為難。〔二七〕

如果要看《乂書》的實際影響，那麼連章炳麟自己也含蓄地承認，它確實不及鄒容、陳天華所做的兩本小冊子，《革命軍》和《猛回頭》。〔二八〕自然，《乂書》仍有讀者，否則不會在一九〇四年出了初版，即校勘欠審、舛誤頗多的圈點本，又會在一九〇六年出再版本，即校勘較審而取消圈點的作者自校本。〔二九〕推其原因，固然在於重訂本在理論上構建了一個體系，一個足以同康有為那套「新學偽經」、「孔子改制」之類說法相抗衡的體系，贏得了具有較高學問素養的新派知識分子的欽仰；但章炳麟以排滿革命的殉道者現身，而清政府和上海租界當局又明白指控《乂書》「言詞紕繆，形同叛逆」〔三〇〕，也應該說是促其暢銷的助力。

肆

章炳麟並非不注意文辭的社會效應。他為鄒容的《革命軍》作序，對這本小書熱情稱道，正是集中於它的「不文」【三二】。古怪的是章炳麟本人的文辭又絕不肯通俗化。他為宣傳排滿而作的那些名論，例如《正仇滿論》、《駁康有為論革命書》、《革命之道德》、《箴新黨論》等，所以在清末被廣為傳誦，在於邏輯，而非文辭。但章炳麟居然還嫌這類文章，「斯皆淺露，其辭取足便俗，無當於文苑」【三三】。因而他對當時上海有人把他的文章與譚嗣同、黃遵憲的文章並列，甚為不滿，說是自己還不屑於同王闈運、康有為等較量文辭，何況譚黃等輩？

對於《尙書》，章炳麟自視更高：「向作《尙書》，文實閎雅。篋中所藏視此者亦數十首。蓋博而有約，文不奄質，以是為文章職墨，流俗所未之好也。」【三三】可惜話音剛落，「《尙書》亦多所修治矣」【三四】，似在證明對此書「未之好」的，還包括他本人。但那是另外的問題，此不具論。

從所謂博約、文質的相關度來看，《尙書》由初刻本到重訂本，的確「閎雅」有加：引經據典，更繁而古；遣詞造句，愈簡而奧。舉一個例，章炳麟極重小學。《尙書》初刻本《訂文》篇，附《正名略例》九則，討論物名官號的更定方案，稱引荀況和斯賓塞，明白地是要求吸取中西所長以制定適合時代的語言概念。這篇附錄在一九〇二年被改撰成《文學略例》，增至十五則，發表於梁啟超主編的《新民叢報》，其中以稱引日本學者代替稱引斯賓塞，並增引多條古典，近雅

了，還易看懂。及至重訂《楹書》，合併增刪兩文成《正名雜義》，擴充至二十三則，儘管在思路上仍未跳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窠臼，但比較中西之語多被刪除，引用故書雅記數量大增，字取古體，典取罕覯，人但舉名，例唯溯古，「文實閎雅」了，並不難解的涵義也被古奧的辭句遮沒了。

由《楹書》「修治」過程體現的這種取向，章炳麟自稱是在「提倡國粹」，或說「文學復古」〔三五〕。他把所謂國粹詮釋為「漢種的歷史」，已足可被譏作「種族革命論的狹隘性」，而他竟說中唐以後的漢文學史，不過是一部退化史，則似乎更是「把繼承民族傳統和復古主義混作一談」〔三六〕。

我以為清末出現的「文學復古」主義，倒不可與「復古主義」等量齊觀。「文學復古」，是外來語，後來被通譯為「文藝復興」。章炳麟何時對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史發生興趣？尚待考證。但他被清末最熱衷於在中國實現意大利式「文藝復興」的一派學者，視作精神領袖，則由一九〇五年二月在上海創刊的《國粹學報》，提供了明證。〔三七〕那以後章炳麟一再把他「提倡國粹」，與意大利的「文學復古」相比擬〔三八〕，更是直接證明。他的追求沒有化作實踐，除了《國粹學報》的無結果的鼓動而外，只有三數學生作過一次以慘敗告終的小小實驗〔三九〕，就是說類似孤鴻哀鳴。我們可以批評他看錯了時間，看錯了空間，却很難直斥為「復古主義」。

確實的，章炳麟要人們注意意大利「文學復古」的先例以後，曾呼籲「葆愛舊貫，毋忘故常」〔四〇〕。這似乎是閔子騫、董仲舒的古老籲求的回聲。但第一，他說的「舊貫」、「故

常」，非指現狀不可變，而指歷史不可忘。因為他以為清朝兩個半世紀的民族壓迫政策，已仗被統治的多數民族忘記了自身有過的輝煌歷史。因此他堅稱反清不是「革命」，而是「光復」，頗有「一民主義」的嫌疑，但比「三民主義」，可以喚起更多憎惡已成寄生羣落的滿族特權的人們，同情乃至追隨革命，也是事實。第二，就說文辭，他以為形式美的歷史高峯，在魏晉至蕭梁，因而他的文章所法之古，既非秦漢，也非唐宋，而是他以為經學衰頹的魏晉南朝，顯然是論道論文自相分裂。人們曾注意「中國通史」的名目，在近代首見於《尙書》重訂本，却很少有人指出首先提出編纂《通史》的，正是梁武帝。以後章炳麟的早年弟子，多留意魏晉南朝故實，如魯迅論魏晉風度，如朱希祖考蕭梁史學，都不能不說受乃師「文學復古」的具體主張的薰染。籠統地抨擊章炳麟的「復古主義」，未必有助於理解歷史。

伍

《尙書》的初刻本和重訂本，分屬於不同的理論體系。我在十多年來墨守的這一拙見，既被遂用，也遭批評，仍有略加申說的必要。

《尙書》的初刻本，以「尊荀」始，以「尊荀」終。我曾指出，這是對戊戌維新期間，夏曾佑和譚嗣同、梁啟超等提倡「排荀」的一種回應。譚嗣同的《仁學》，曾說兩千年來中國只有「秦政」，只有「荀學」，二者屬於在政治上和在學術上朋比為奸的大盜。這意見出於夏曾佑。

而夏曾佑以爲中國的專制主義政治傳統，應歸咎於荀況。這既是顛倒汪中的看法，也是對康有爲以爲君主專制的禍首是劉歆一說的批評【四二】。章炳麟同夏曾佑是知交，又熟知康有爲的理論弱點，因而他標榜「尊荀」，反題便是否定「排荀」，自然也是繼續否定「尊孟」。

但學說分歧與政見對立並非一回事。《卮書》的研究者，無不注意初刻本內的兩篇論文——《客帝》和《分鎮》，在重訂本中被醒目地移作「前錄」，而且都加上了跋語，表示自我懺悔。他懺悔的要點，就是說在戊戌政變後亡命海外的一段時期，「與尊清者游」，而犯了兩大錯誤。一錯在相信「保皇」主張，繼續寄希望於光緒皇帝個人的「聖明」，從而模糊了排滿的目標。二錯在相信「借權」主張，指望利用各地漢人督撫的權力，迫使清帝國統治者實現自上而下的改革，從而模糊了自主的要求。【四二】這兩則懺悔，無疑是受義和團和自立軍的雙重失敗的刺激後作出的。這既是他與康、梁在政治上分手的表徵，也是他同孫中山等合作反清的開端。

章、孫初次相見於一九〇二年春天。亡命在日本的孫中山，按照祕密會社接待盟友的傳統，爲章炳麟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，使這名追求「獨聖」的窮學者甚爲感動【四三】。到那時爲止，孫中山的革命史，雖與康有爲的變法活動史，幾乎一樣長，但在中國的新舊知識分子的眼中，他都是個綠林梟雄式的人物，儘管他和他的戰友都多半受過良好的西方教育。他的革命活動長期局限於海外和南疆，從來沒有像他的粵籍同鄉康有爲、梁啟超那樣，成功地得到中國腹地區學者文士的支持或同情。在戊戌政變後，他曾極力謀求同逃亡海外的康、梁結盟，但都遭拒，被拒的一個原因，顯然是康、梁怕失去國內贊成溫和的改革主張的學者文士的支持或同情。章炳麟作爲